

亞廠商的內在結構與績效

● 李維森

一 引言

行政控制經濟各國的經濟改革，普遍遇到了通貨膨脹的難題，在改進微觀經濟單元的效率方面，亦是步履維艱。80年代以來，行政控制經濟各國為了改進國有企業的營運效率和遏制通貨膨脹，幾乎耗費了改革理論家們的絕大部分精力。筆者認為，這兩個問題是有着內在聯繫的。欲對這兩個問題有深層的理解，須用新的方法對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基礎的內在結構(infrastructure)與其績效(performance)的關係進行理論探索。在對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基礎進行理論分析之前，我想在這裏引入三個新術語：

第一，行政控制經濟，在英文中我稱它為administratively controlled economy。多年來，東西方的經濟學家已慣於稱當代社會主義經濟為中央計劃經濟，也有一些西方學者稱它為「蘇式經濟」或「命令經濟」。筆者認為，這些術語均不能恰當的反映這一

經濟模式的本質特徵，特別是中央計劃經濟一詞，是一個含義非常不確定且容易令人誤解的概念。限於文章的篇幅，我們不可能深入的討論這些術語。這裏，我僅想指出，行政控制經濟一詞，較能準確地把握這一經濟模式的本質。加之，如果把社會主義經濟各國的改革，理解為從行政控制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將會使人們更加清楚地把握經濟改革的實質與方向。

第二，亞廠商，在英文中我稱它為quasi-firm。熟悉西方經濟學的學者會知道，西方微觀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理論和70年代後興起的廠商理論，是把廠商(firm)作為其分析對象的。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在行政控制經濟的古典模式中，西方微觀經濟學中的廠商是不存在的。因為，在這一古典模式中，所有社會生產資料在理論上被假定為國有資產(集體所有制企業的資產可被看作為亞國有或準國有，從而在我們的理論分析中不予考慮)。因而，整個國有經濟可以被

在行政控制經濟的內部，國有工廠和其他企業單位只具有「廠商」的形式，但它們實際上是一個「超級廠商」內部的不同車間和科室。

雖然國有企業的資產在理論上被假定為社會全體成員所公有，但是，單個社會成員實際上並沒有這種剩餘收益的索取權。因而，行政控制經濟的古典模式，並不具有真正的產權結構。

看作為一個廠商。或按科斯(R. Coase)^①和張五常^②的術語來說，整個行政控制經濟是一個「超級廠商」(superfirm)。在行政控制經濟的內部，國有工廠和其他企業單位只具有「廠商」的形式，但它們實際上是一個「超級廠商」內部的不同車間和科室。換句話說，所有國有企業並不是各自獨立的廠商，而是建立在不同時空的一個廠商內部的亞組織。因而，在本文以下的分析中，我把行政控制經濟中的國有企業稱為亞廠商。

第三，所有者空缺，英文為vacancy of owners。筆者所使用的「所有者空缺」概念，與80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所時尚的「所有者缺位」，以及與科奈(J. Kornai)在他1990年出版的《通向市場經濟之路》的小冊子中所使用的國有資產的「非個人化」(impersonalization)^③意義相近。這裏需要指出是，我們使用的「所有者空缺」與西方經濟學中的「所有者缺席」(absence of owners)概念是有區別的。所有者缺席，是指隨着現代公司的崛起而出現的所有與經營的分離

現象。用現代經濟學的說法，這一概念實質上是指在現代公司制度中，在資產組合管理(management of portfolio)與生產管理分離後，所有者(本股持有者)不再干預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而我們所說的「所有者空缺」，是指行政控制經濟中的一種特殊現象，亦即「國有企業」的資產沒有真正的所有者。因而，在亞廠商內部，所有者不是缺席(absent)，而是「空缺」(vacant)。這裏，我們不是像科斯^④和巴塞爾(Y. Barzel)^⑤那樣在廣義上把產權界定為市場交換中的經濟當事人的益損、權利及責任的邊界，而是在較窄的意義上把產權理解為剩餘(收益)的合法索取權(residual claimancy)。相應地說，我們在這裏所說的真所有者，亦是指剩餘(收益)的法定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s)。從這種意義上說，雖然國有企業的資產在理論上被假定為社會全體成員所公有，但是，單個社會成員實際上並沒有這種剩餘收益的索取權。因而，行政控制經濟的古典模式，並不具有真正的產權結構。筆者認為，亞廠商是在一種產權虛存(nonentity of property rights)的環境中運行的。

由於真所有者空缺，在亞廠商內部有一種參與者各自利益追求上的失衡。假如沒有外在的(政府的)行政干預，在亞廠商內部，將會存在一種把所有企業收益轉化為工人和管理者的個人收入的傾向。相應地，亞廠商內部的資本形成與自我增殖乏力。在由於真所有者空缺所引起的內部組織失衡的運行條件下，行政控制經濟中的亞廠商之所以能夠維持半個世紀以上，並且在一些國家繼續運作，有兩個原因：第一，政府以行政命令及其



他超經濟的強制手段，把一些人強行限制在各個亞廠商內：第二，政府的計劃者直接干預亞廠商的經濟活動，並部分地填充了亞廠商內部的資產所有者的空缺。在政府計劃者從某種程度上「缺席」地填補了行政控制經濟中的亞廠商內部的真所有者空缺之後，國有企業的資本的形成與積累變成了他們的任務。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政府官員對國有企業內部資本形成和積累的關心，並不是出自他們自身的經濟利益，而是出於其職位責任。因為，儘管政府機構持有國有企業的剩餘收益的索取權，但這種索取權並不是出自政府官員的個人產權，而是出自某種行政理由。

二 亞廠商內部工人和管理者的「努力矯」增現象

2.1 管理鬆懈概念

在對行政控制經濟中亞廠商內部的真所有者空缺與產權虛存現象作了簡單的探討之後，讓我們進一步分析這種內在結構安排是怎樣決定其績效的。在現代企業中，不管是在市場經濟中的廠商內部，還是在行政控制經濟中的亞廠商的內部，管理者均在企業的經營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而企業的內在結構安排與效績之間的關係，亦直接決定於企業管理與企業行為之間的關聯機制。在分析管理與行為及績效之間的關係之前，我想在這裏引入幾個新術語。首先，我們在這裏引入一個標示管理時間投入量不足和管理偷懶(managerial shirking)的綜合概念。我稱這一概念為「管理鬆懈」(managerial slack)。管理鬆懈可

以用公式(1)來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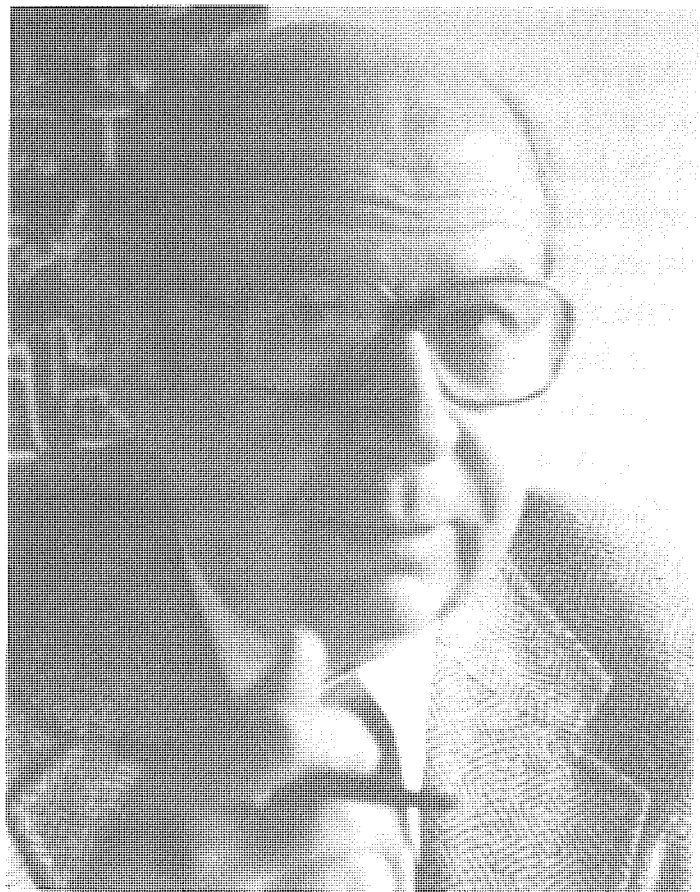
$$\phi = X_m^* - X_m = E_m^* Z_m^* - (1 - \theta_m) Z_m$$

$$(E_m^* = 1, Z_m^* \geq Z_m, 0 \leq \theta_m \leq 1)$$
(1)

在式(1)中， ϕ 表示管理鬆懈： X_m^* 表示管理勞動投入量的一個理想值： X_m 管理勞動投入量的實值： E_m^* 表示管理者的充分努力水平： Z_m^* 表示管理者職位所要求的管理勞動時間投入量： θ_m 表示管理偷懶水平(我們進一步假定管理努力加管理偷懶等於1，即 $E_m + \theta_m = 1$)： Z_m 表示管理者的實際管理勞動時間。

在式(1)中可以看出，假如管理者沒有盡到充分的努力，或者管理者沒有投入足夠的管理時間，管理鬆懈必然存在。

齊奧塞斯庫·羅金(圖)等人將熱力學的概念應用在經濟學領域，由此取得相當豐碩的理論成果。



2.2 工人的努力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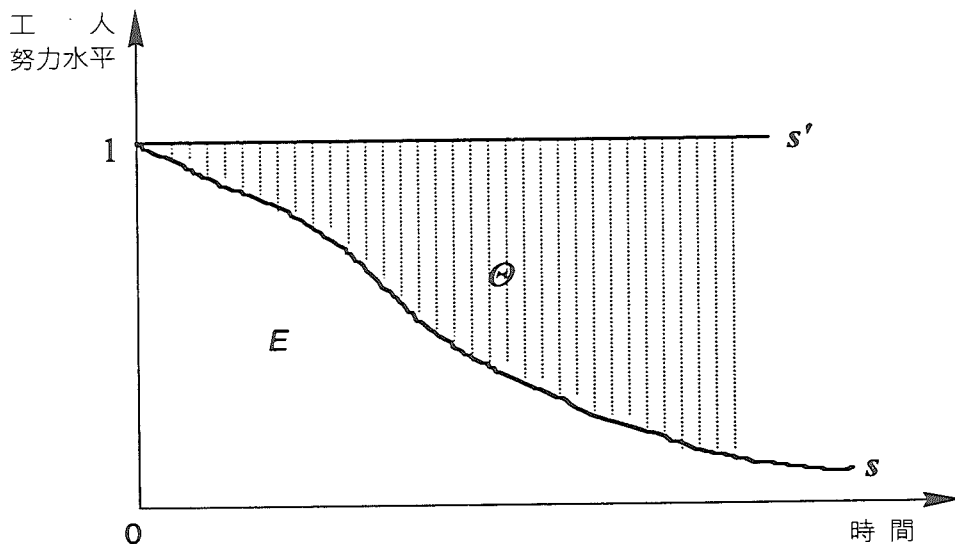
「熵」本來是一個熱力學的概念。在熱力學中，它是指一個系統中分子的無序度，而這種無序度決定了該系統在自然過程中，其內部能被用來作功的熱能的大小。「熵」的概念最早被美國信息經濟學家塞爾(H. Theil)引入經濟學中^⑥。而美籍羅馬尼亞經濟學家齊奧塞斯庫·羅金(N. Georgescu-Roegen)在他那本對西方經濟學界頗具影響的《熵法則與經濟過程》^⑦中，進一步確立了「熵」概念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地位。在80年代初，雷夫金(J. Rifkin)和豪沃德(T. Howard)亦探討了「熵增」法則對人類現代及未來社會的影響^⑧。在70年代中期，哈佛大學的萊賓斯坦教授(H. Leibenstein)在《超越經濟人》一書中，使用了「努力熵」和「組織熵」概念^⑨。但是萊賓斯坦並沒有對這兩個(或同一個)概念加以明確的解釋和界定。在本文中，我們是把工人的「努力熵」定義為其工作偷懶(shirking)程度的增加傾向。而工人努力熵增現象的實質，可以用圖1來說明。

「熵」本來是一個熱力學的概念，後來被美國信息經濟學家塞爾引入經濟學中。而齊奧塞斯庫·羅金則進一步確立了「熵」概念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地位。

在圖1中，x軸表示時間的流逝；y軸表示工人的努力水平。曲線s'標示着工人的努力熵增現象。曲線s'標示一個亞廠商內部職工在一定的時間區間內總是保持充分努力水平，即 $\forall E_{it} \in E_t = 1$ 。x軸和曲線s間的距離表示一個廠商內部工人在一定時點t上的實際平均努力水平。而曲線s和曲線s'間的距離，表示工人在一定時點t上的平均偷懶水平。圖1告訴我們，假如沒有監督，或者有監督但管理鬆懈值趨向於管理勞動投入量值，即 $\phi \rightarrow X_m$ ，隨着時間的流逝，工人的實際努力水平將趨向於零。相應地，他們的偷懶水平將趨向於1。這裏應該指出，曲線s'也表示工人的努力熵現象。它告訴我們，即使工人的努力水平在一定的時間內被保持在數值1，即所有的人在這一時期中都盡了自己充分努力，曲線s'仍然包含着一個降落到x軸的潛勢，亦即這一廠商內部仍然存在工作偷懶水平增加的傾向。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工人努力熵增的原因。我們首先要指出的是，行政經濟中亞廠商內部成員的努力熵增

圖1 工人努力熵增現象



的基本原因，是他們仍然是理性的經濟人。每一個成員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均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而每個人作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者，在固定工資制度的條件下，必定是工作努力的最小化者（這裏，我們假定工作偷懶的個人成本為零）。亞廠商內部成員的努力熵增現象的另一個原因是管理鬆懈。可能是從後一個原因出發，萊賓斯坦指出，對抗努力熵增現象是企業管理的一個主要任務^⑩。其實，早在半個世紀前，海耶克 (F.A. Hayek) 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他指出：「遏制成本的增加要求管理者的不懈的努力，耗費其絕大部分的精力。」^⑪從圖1中，我們也可看出，企業管理的一個主要任務，是盡量地使曲線s接近曲線s'。我們亦可以說，最理想的管理狀態是曲線s與曲線s'的重合。結合圖1和式(1)，可以看出，工人努力熵不僅取決於管理時間的投入量 Z_m 和管理努力水平 E_m ，亦取決於管理勞動投入量的效率。因此，可以說，工人的努力水平往往並不是管理時間和管理努力的線性函數，原因在於管理效率變量和工人的合作與否在起一定的作用。因此，假設管理時間和管理努力已經給定，企業管理者對抗工人努力熵增的主要任務是提高管理效率及諧和與工人的關係。

鑒於現代發達的管理科學已有許多提高管理效率的理論，我們勿庸進一步探討改進管理效率的問題。這裏，我們只想強調與前面的論述有關的兩點：第一，勞動者進入一個崗位的競爭程度；第二，勞動團組 (working group) 的大小。

首先，按照萊賓斯坦的「努力(水平)惰變區」理論 (theory of effort inert areas)，在一個勞動團組中，各

個工人的努力程度是互相影響和互相依賴的^⑫。在這種情況下，至關重要的是管理者能否決定替換，甚至開除那些嚴重威脅整個團組努力水平的偷懶者。假如有此權力，管理者就有很大的可能性增加管理效率。相反，假如無此權力，管理者難有一個有效的管理。

其次，假如其他條件給定，勞動團組規模越大，便越難監督每一個工人的實際努力水平，其團組內部工人的努力熵增亦越快。這裏也順便指出，亞當·斯密 (A. Smith)、馬克思 (K. Marx) 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曾發現，勞動分工和生產的社會化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但這些古典經濟學家們卻沒有看到這樣一個事實：隨着生產規模的擴大和分工的加細，生產組織內部成員的努力熵增亦加快。由於這兩種逆向力量在同時起作用，人們往往很難判斷伴隨着生產規模的擴大的是收益遞增 (increasing return)，還是收益遞減 (decreasing return)。為了改進管理勞動的效率，管理者可以把整個組織分成數個相應小的工作單元，然後挑選一個人來專門監管每一個小工作單元。但是，這會增加監督成本，亦會在不同工作單元之間造成一些信息的溝通、組織的協調以及激勵的傳輸諸方面的問題。

2.3 管理者的努力熵

萊賓斯坦曾指出，努力熵是一個普遍現象。它不僅適用於工人，也適用於管理者和企業家^⑬。那麼，進一步的問題是，既然管理者亦有努力熵增趨勢，那麼管理者的努力熵的產生機制是甚麼？在探討管理者的努力熵的產生機制之前，我們有必要弄清亞

廠商管理者的基本職能。儘管在行政控制經濟中，亞廠商的管理者有着雙重身分，即一方面作為勞動者，另一方面作為政府官員，但他們的基本職能與市場經濟中廠商的管理者基本上是相同的，即從外部環境中接收和傳輸經營信號，並監督和控制整個組織的營運。如果我們假定市場經濟中廠商的管理者和行政經濟中亞廠商的管理者均為自我利益的追求者，他們也同樣服從努力熵的自然法則，即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亦有一種管理偷懶增加的潛勢。

然而，在行政控制經濟中的亞廠商的管理者和市場經濟中的廠商的管理者之間亦有一些不同。第一，市場經濟中廠商的管理者(例如，所有者缺席的現代公司的經理)是受僱並服務於本股所有者，同時亦接受董事會的指令。因而，從董事會來的增加股票所有者的收入的壓力，是遏制廠商管理者努力熵的主要力量。然而，在行政控制經濟中，由於真所有者空缺，亞廠商的管理者為上級政府所任命。因而，他們聽從其上級的指令而服務於「社會」。結果，完成政府計劃指標的壓力，是遏制亞廠商的管理者的努力熵的主要力量。第二，廠商的管理者主要從市場環境中接收經營信號，因而，市場競爭是廠商管理的努力負熵 (managerial effort negentropy) 的主要源泉。市場競爭程度越高，廠商管理者努力熵增越慢，反之，市場競爭程度越低，廠商管理者努力熵增越快。在行政控制經濟的古典模式中，由於市場機制相當有限，市場競爭作為管理者的努力熵主要源泉幾乎不存在。替而代之的是政府的行政管理成了亞廠商管理者的努力負熵的主要來源。政府行政的效率越

高，亞廠商管理者的努力熵增越慢，反之亦然。

三 亞廠商內部的組織熵和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3.1 組織熵概念和亞廠商作為具有耗散結構的開放系統

在分別討論了亞廠商內部的工人的努力熵和管理者的努力熵概念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把這二者歸結為一個綜合概念，即組織成員的努力熵，或簡稱為組織熵。

在上述分析中，我們已經指出，工人的自我利益的追求，是其努力熵增的基本原因，而管理鬆懈則是另一個原因。在引進組織熵概念之後，我們仍然可以說組織熵與管理鬆懈正相關，即管理鬆懈越高，亞廠商的「非組織態」(disorganization) 程度越大，其組織熵增越快。組織熵增的另一原因，是工人和管理者對某個工作的厭倦。在人們經年累月地做同一種工作後，他們自然會感到厭倦，從而會有一種增加工作偷懶和怠惰的傾向。從後一個原因來看，組織熵有些像物理熵一樣，是一個不可改變的自然過程，即二者同樣遵循克勞修斯法則：任何一個孤立系統內部的自由能，均不斷地衰變為約束能^④。假如亞廠商是一個封閉或孤立系統，它內部成員的工作努力水平將趨向於零。在此情況下，假如一個亞廠商要得以維持，換句話說，假如一個亞廠商不要徹底的非組織化(指內部組織熵在處於非常大的狀態)，它必須為一個開放系統。

為了弄清開放系統的涵義，這裏

在行政控制經濟中，亞廠商的管理者有着雙重身分，即一方面作為勞動者，另一方面作為政府官員，他們的基本職能是從外部環境中接收和傳輸經營信號，並監督和控制整個組織的營運。

似乎有必要引介著名的比利時物理化學家、1977年諾貝爾化學獎的得主普利高津(I. Prigogine)的耗散結構理論。按照該理論，任何生物機體，從最簡單的單細胞到複雜的人體，都是具有耗散結構的開放系統¹⁵。普利高津和尼古拉斯(G. Nicolis)還指出，任一生物系統要存活，必須與外部世界交換能量與物質。薛定諤(E. Schrödinger)進一步把這一思想明確表述出來。他指出，任何作為開放系統的有生命結構要存活，必須與其環境進行熵交換¹⁶。

如果把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運用到我們的理論分析中，我們可以說，一個亞廠商如果要維持運行，它就必須是一個具有內在組織努力水平非均衡態(nonequilibrium state)的開放系統。作為一個具有耗散結構的開放系統，亞廠商要求與外部世界進行組織熵交換來維持其自組織。為了在亞廠商內部維持一個低組織熵狀態，或按照普利高津的術語，維持一個其內部成員的努力水平的「穩定的非均衡態」，它要求持續不斷地從外部注入一種組織負熵流，並要求這種組織負熵流的值大於或等於其內部組織熵的生產量。仿照普利高津和尼古拉斯的闡釋，一個亞廠商的組織熵的產生機制可以用以下公式來表示¹⁷：

$$dS_E = d_i S_E + d_e S_E \quad (2)$$

在式(2)中， dS_E 表示亞廠商的組織熵增(或減)； $d_i S_E$ 表示由於亞廠商內部的一些自然過程而導致的組織熵生產； $d_e S_E$ 表示由於亞廠商與外部環境交換信息而產生的組織熵通量。

從上面對工人和管理者努力熵的分析中，我們亦可以發現：

$$d_i S_E \geq 0 \quad (3)$$

(當 $d_i S_E=0$ ，組織內部成員的努力水平在一個均衡態)

式(3)告訴我們這樣一個事實：在一個亞廠商建立的初始階段，其成員的努力水平處於一種非均衡態，即其成員具有一種增加工作偷懶的自然傾向。假如該亞廠商是一個封閉系統，其內部成員的工作偷懶水平將趨向於1，即 $\Theta \rightarrow 1$ ， $d_i S_E \rightarrow 0$ ，從而 $dS_E = d_i S_E = 0$ 。而 $dS_E = d_i S_E = 0$ 意味着該系統就其組織熵增來說處於一種均衡態。這也意味着工人和管理者的努力水平在最低點。相反，假如該亞廠商是一個開放系統，它必須與外部環境不斷地交換組織熵，從而保持其內部成員的努力水平總是處於一種非均衡態。因此，為了維持該亞廠商內部的組織熵的初始水平或爭取一個更低的水平，它必須滿足以下條件：

$$\Delta S_E = \int_{\text{path}} dS_E \leq 0 \quad (4)$$

從式(3)中，我們也可以推導出，只有在滿足式(5)的條件，式(4)的狀態才會存在，即：

$$|d_i S_E| \leq |-d_e S_E| \quad (5)$$

式(5)告訴我們，亞廠商作為一個開放系統，要維持其內部組織熵在一個低水平或保持其水平不變，它需要不斷地從外部注入一定量的組織負熵 $-d_e S_E$ (其絕對值大於或等於 $d_i S_E$ 的絕對值)。只有在此情況下，該亞

如果把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加以應用，我們可以說，一個亞廠商如果要維持運行，它就必須是一個具有內在組織努力水平非均衡態的開放系統。

廠商才能維持其內部成員的努力水平處於一個穩定的非均衡態。

3.2 亞廠商對組織負熵流的渴求與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上一小節的分析比較抽象。但在這種抽象分析中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行政控制經濟中的任一亞廠商要繼續運作，它就必須是一個開放系統。而作為一個開放系統，它要求一些外部系統不斷地注入一定量的組織負熵流，以維持其內部工人和管理者的努力水平在一個穩定的非均衡態。現在進一步的問題是，來自外部世界的甚麼樣的信息包含着這種組織負熵流 $-d_e S_E$ 呢？

從本文引言的分析中，我們可以邏輯地推導出，政府行政是亞廠商的組織負熵流的主要供給源。例如，來自政府的完成計劃指標的指令，和提高產量的行政命令，可以看作含有組織負熵流的信息流。一些政府發動的政治運動，例如30年代末到40代末蘇聯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和60、70年代中國的「工業學大慶運動」，亦能夠注入亞廠商內部一些組織負熵流。除政府行政外，這種組織負熵流也可來自其他環境源。比如，其他亞廠商的優績效，特別是那些在同行業和鄰近的亞廠商的好績效，會對一個亞廠商產生一定的組織負熵流。其他亞廠商的績效越好，便會把越強的信號傳輸到該亞廠商，從而促其內部成員提高努力水平，這也意味着越多的組織負熵流注入到該亞廠商。

這裏必須指出，當我們說完成政府計劃指標的強制和其他政府的行政命令，以及來自其他一些環境源的信號會給一個亞廠商帶進一些組織負

熵，但並不是說 $d_e S_E$ 必定是負的。這更不是說所有信息均包含着負熵，即 $-d_e S_E \neq \text{information}$ ⑩。 $d_e S_E$ 既可以是正的，也可以為負的。這意味着外部系統既可以把組織負熵，亦可以把組織商注入亞廠商內。如前所述，完成政府計劃指標的壓力和其他政府的行政命令能夠注入亞廠商內部一些組織負熵，即提高其內部成員的努力水平。相反，一些政治運動和社會的動盪，亦可把組織熵注入亞廠商內，即提高其內部成員的偷懶水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後者的典型例子。同樣道理，其他亞廠商的劣績效，亦會給一個亞廠商注入一些組織（正）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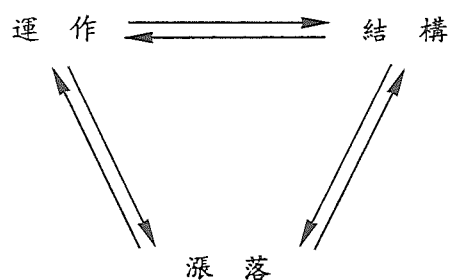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由於參與者利益約束和經營決策方面的組織失衡，行政經濟中的亞廠商並不是一個完整的自組織系統。這意味着亞廠商並不能藉自我調整來維持其內部成員的努力水平在一個穩定的非均衡態。為了維持其內部成員的努力水平的非均衡態，亞廠商本身要求從外部的環境源注入一些組織負熵流，這主要包括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其他行政干預。因此，可以說行政控制經濟中的亞廠商的內在結構設置，衍生出政府以行政干預其經營活動的必然性。

當然，當我們說行政控制經濟中亞廠商的內在組織失衡，要求其自身必須是一個開放系統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儘管市場經濟中的廠商有一種在其參與者的利益約束和經營決策方面的內在組織均衡，它們仍然可以被看作為具有耗散結構的開放系統。這意味着市場經濟中廠商內部的工人和管理者同樣有增加其努力熵的自然傾向。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由於市場經濟中廠商內部具有一種在其參與者

行政控制經濟中的任一亞廠商要繼續運作，它就必須是一個開放系統。而作為一個開放系統，它要求一些外部系統不斷地注入一定量的組織負熵流，以維持其內部工人和管理者的努力水平在一個穩定的非均衡態。

由於亞廠商不能藉自我調整來維持其內部成員的努力水平在一個穩定的非均衡態，所以要求從外部的環境源注入一些組織負熵流，因而衍生出政府以行政干預其經營活動的必然性。

的相互利益約束方面的組織均衡，假如任一工人或管理者被辨認為偷懶者或怠惰者，他(或她)就會被所有者解僱。因此，可以說，缺席所有者對其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不斷地為市場經濟中的廠商注入組織負熵。基於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市場經濟中的廠商具有一種內在的組織自動平衡機制(a built-in organizational homeostasis)。用普利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來說，缺席所有者對其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用普利高津的術語來說，即「漲落」)，使市場經濟中廠商內部的工人和管理者的努力水平總是保持在一個非均衡態或非穩定態。因此，市場經濟中的廠商具有如下一種普利高津式的自動平衡機制：



儘管一個廠商具有這樣一種內在的自動平衡機制，它仍然要求與外部世界進行組織熵交換。然而，在自由市場的環境中，一個廠商所需求的組織負熵絕大部分來自市場競爭，很少來自政府行政。例如，在股票市場上，一家公司的股票價格的持續下跌，將會給該公司的管理班子一個很強的信號，促其改進經營績效。因此，可以說，一個公司的股票價格的跌落，意味着股票市場正在為該公司內部注入一些組織負熵。

由於在如前所述的行政控制經濟中，亞廠商有其內在結構方面的先天缺陷，即真所有者空缺，它們是不具

備這種普利高津式的「結構 \rightleftharpoons 漲落 \rightleftharpoons 運作」自動平衡機制的。因此，行政控制經濟中的亞廠商，並不是一個完整的自組織系統。加之，由於市場競爭幾乎不存在於行政控制經濟的古典環境中，因此，亞廠商所必要的組織負熵流，必須依賴於其主要供給源——政府行政。基於這一原因，我們認為，是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單元的內在結構設置導致政府經濟決策的中央集權。從這一視角，我們相信，經濟決策的中央集權和政府的行政干預，並不是出於政府官員的喜好發號行政命令的官僚本能(bureaucratic instincts)，而是因為亞廠商本身要求這種行政命令來保持其內在組織熵的非均衡態。正如一個吸毒者渴望從毒品供應者那裏得到鴉片一樣，亞廠商渴望從政府行政中獲得組織負熵。

現在，我們似乎已觸及到社會主義國家在其行政控制經濟的古典階段上高度中央集權的根本原因。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們曾對政府經濟決策的高度中央集權，提出過許多批評。但他們都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這一時期政府經濟決策的過度中央集權，並不是根源於政府計劃人員的官僚願望和他們的喜好發號行政命令的生性或自然本能，而是主要源於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單元——亞廠商對組織負熵的渴求。

3.3 行政控制經濟各國改革中出現的一個兩難困境：為甚麼政府放不開對企業的控制與干預？

到目前為止，行政控制經濟已被東歐、獨聯體各國以及中國的經濟運行的實踐證明是非經濟的。然而，這

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都忽視了一個事實：這一時期政府經濟決策的過度中央集權，並不是根源於政府計劃人員的官僚願望和他們的喜好發號行政命令的生性或自然本能，而是主要源於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單元——亞廠商對組織負熵的渴求。

一經濟制度及改造其運行的種種嘗試失敗的原因，似乎仍然困惑着許多人。回顧行政控制經濟的改革歷史，可以看出，在改革的初期，社會主義各國的大部分經濟學家和政府領導人都曾有一個誤解：行政控制經濟中高浪費、低效率和其他種種弊端，主要根源於缺乏市場機制和政府經濟決策的過度中央集權。因而，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曾經預計，在微觀經濟單元運行的宏觀環境中引入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後，如進一步採取所有與經營權分離的措施，以形成國有企業獨立商品生產者的地位，行政控制經濟的種種弊端即可消弭。然而，這種以引進市場機制和擴大企業自主權為基本初始目標的經濟改革，卻給經濟學家和改革方案設計者們提出了一個始料不及的難題，這就是，只要政府一放鬆

蘇東諸國政府由於無法處理其對企業的放權與控制的問題，最終只得下台。

對企業的行政控制，就出現一個工人和管理者的工資和獎金的膨脹，接着出現一個以個人可支配收入膨脹為主驅動力的通貨膨脹。結果，政府不得不重新強化對企業的行政控制。因而，他們都曾陷入一個兩難困境：企業渴望從政府中獲得經營自主權，政府領導人也準備並樂意放權給企業，但經濟改革的實踐卻反過來要求政府強化對企業的行政控制。在解決這一兩難困境上的無能為力，是80、90年代之交(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社會制度驟變和共產黨政府下台的根本原因。但即使在共產黨政府下台後，這些國家的經濟仍然深陷於這一兩難困境中。毋庸諱言，目前中國的經濟學家和政府領導人，仍深為這一兩難困境所困擾。

由於深陷於這一兩難困境，從



四 結 論

80年代中期以來，人們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以行政控制經濟的國家在改革過程中所普遍出現的通貨膨脹，並不是出於宏觀方面的政府政策選擇上的失誤，而是源於微觀方面的經濟基本單元的內在結構失衡，亦即源於亞廠商內部資產的真所有者空缺。其傳導機制為，不管任何時候，只要政府放鬆對亞廠商的行政干預與控制，存在於亞廠商內部的參與者的相互利益制約和經營決策方面的組織失衡，就會鮮明地彰顯出來。由此，工資和獎金膨脹及由這一膨脹所推動的物價上漲就在所難免。因此，可以說，微觀方面的亞廠商內部資產所有者的空缺，和宏觀方面的政府對亞廠商的全面行政控制和干預，是共生現象(symbiosis)。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判斷：在行政控制經濟中的亞廠商成為完整的自組織之前，它們是不能從政府的行政控制與干預中完全獨立出來的。否則，如果政府硬行放棄其對亞廠商的控制與干預，這會全面打開亞廠商內部轉化企業收益為個人收入的固有渠道(a built-in channel)的控制閥門，從而為已經啟動的通貨膨脹的微觀發動機注入更多的燃料，另一方面則會切斷這些亞廠商的組織負擔的供給源，從而令其內部組織負擔增加快，並必然導致這些亞廠商內部的X-負效率(英文為X-inefficiency。萊賓斯坦在70年代提出這一概念，其涵意為在給定資源和技術條下，一個生產組織內部的實際生產效率與技術可行性最高效率之差^⑨)越來越大。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在改革中經濟效益急劇滑坡，虧損面不斷擴大，以致每年虧損數百億元，就充分證明了我們這一理論判斷。

以真所有者空缺為基本特徵的組織失衡，是行政經濟中亞廠商的先天痼疾。在行政控制經濟的古典階段，亞廠商這種先天的組織失衡問題被政府的「無微不至」的行政控制所掩蓋了。但是，一旦行政經濟各國的政府在其改革過程中授與亞廠商一些經營自主權，這一問題就鮮明地暴露出來。到目前，行政控制經濟各國的大多數經濟學家似乎已趨同於這樣一種認識：完成行政控制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一個先決條件，是重組微觀經濟單元的內在結構。一旦行政控制經濟各國的經濟學家們和政府領導人意識到舊體制的絕大多數弊端均肇端於微觀經濟單元的內部產權結構，經濟改革的主要努力則被導向於重建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基礎。從產權的角度來看，行政控制經濟的微觀改革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設計一些經濟機制來盡量減少由於亞廠商內部資產的所有者空缺所造成的組織失衡的不利影響。從60年到80年代(前)蘇聯和東歐各國所試行的各種激勵機制，以及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所試行的各種承包責任制，基本上可以被歸諸於這一範疇。然而，60年代以來蘇東各國的改革和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改革表明，儘管這一類微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進了國有企業的績效，但它們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行政控制經濟微觀單元的低效率問題。相反，這種改革卻開啟了企業工人和管理者個人收入迅速上漲的引擎。而個人收入的迅速上漲，又引致了持續的通貨膨脹。

第二，通過私有化和其他措施，

目前中國大陸發生着一種自下而上的和自發的私有化過程。這是在前幾年西方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同時，中國經濟還能保持高速增長的一個基本原因。

創造一些真所有者來填補亞廠商內部的資產所有者空缺。80年代後期以來，東歐和獨聯體各國已在這方面作了極大的努力。但一些有見地的西方經濟學家卻認為，中國在私有化方面作的更穩妥紮實。因為，儘管中國政府沒有像東歐和獨聯體各國政府那樣採取一種「揠苗助長」的急進私有化措施，但目前中國大陸實際上發生着一種自下而上的和自發的私有化過程。這是在前幾年西方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同時，中國經濟還能保持高速增長的一個基本原因。筆者亦同意這一判斷。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一旦行政經濟微觀單元的資產所有者空缺為真所有者所填補，亞廠商就會蛻變為廠商。然而，不管這一微觀基礎的重組多麼困難，也不管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過程需要多長時間，除非大多數亞廠商已演變為廠商，一個行政控制經濟是不可能轉變為市場經濟的。

註釋

- ①④ Ronald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1-44 (1960).
- ② Steven N.S. Cheung: "Common Property Rights", *The New Palygrave: A Economic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1 (1987), pp. 504-505.
- ③ János Kornai: *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57-58, 111, 172.
- ⑤ Yoram Barzel: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⑥ Henri Theil: *Econom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67).

⑦ 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⑧ Jeremy Rifkin & Ted Howard: *Entropy: A New World View*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0).

⑨⑩⑫⑬⑰ Harvey Leibenstein: *Beyond Economic 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① Friedrich A. Hayek: "The Use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p. 523, 55:523 (1945).

⑭ 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Entropy", *The New Paly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 1 (1986), pp. 153-56.

⑮⑰ G. Nicolis, G. & I. Prigogine: *Self-Organization in Nonequilibrium Systems: From Dissipative Structure to Order through Fluctu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77), pp. 24-25. Ilya Prigogine: *From Being to Becoming: Time and Complexity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1980), pp. 103-108; 5-9.

⑱ E. Schrödinger: *What Is Lif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5).

⑲ 關於信息與熵的關係，可參 Claude E. Shannon & Warren Weaver: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49)，以及 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同註⑦，尤其是Appendix B。

李維森 1953年生，曾為《東岳論叢》編輯、山東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員。現為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候選人。曾在學術刊物上發表多篇論文。